

金元楠
主编

当代文化产业论丛

国家利益 与文化政策

Guojia Liyi
yu Wenhua
Zhengce

张玉国·著

Cultural Industry

广东人民出版社

国家利益 与文化政策

Guojia Liyi
yu Wenhua
Zhengce

张玉国·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张玉国著.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4

(当代文化产业论丛)

ISBN 7-218-04883-8

I. 国... II. 张... III. 文化-产业-研究报告-中国
IV. G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13893 号

选题策划	金炳亮
责任编辑	黄洁华
封面设计	方 雷
责任技编	黎碧霞
出版发行	广东人民出版社
印 刷	肇庆市科建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毫米×1168毫米 1/32
印 张	9.375
插 页	1
字 数	22.5万
版 次	2005年4月第1版 2005年4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5000册
书 号	ISBN 7-218-04883-8/G · 1259
定 价	20.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出版社(020-83795749)联系调换。

(售书热线: 020-83799595 020-83791084)

中国文化产业进入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代总序)

金元浦

如果说 1994—2003 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准备酝酿探索的阶段的话,那么,随着我国加入 WTO 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进入小康社会,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已进入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

1994—2003 年是我国文化产业的酝酿探索的起步阶段,在这八九年中,我国文化产业界逐步转变了观念,初步探索了文化产业发展的现实道路。从历史看,我国文化产业的理论研讨的起步与欧洲、日本、韩国相比并不晚,但在观念上却徘徊多年,造成实践上长期停滞不前的局面。欧洲、日本和韩国 90 年代中期。先后致力于发展文化产业,1995 年,日本文化政策推进会议在其重要报告《新文化立国:关于振兴文化的几个重要策略》中,确立了日本在未来 21 世纪的文化立国方略。其后,韩国也提出,知识密集型和高附加值的文化产业是最适合韩国的产业。政府制定了切实可行的政策,将文化产业培育成 21 世纪在韩国经济中起先导作用的国家基于产业。方针政策确定之后,日韩两国的文化产业得到快速发展,游戏软件、动漫画、日剧韩剧等文化产业迅速成长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在振兴本国经济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国对文化产业的关注和讨论是较早的,《中国文化报》早在 1994 年就率先举办了中国文化产业征文和讨论,为文化

产业的发展做了理论上的探索。但总体发展阶段的限制、计划经济框架下的文化体制和观念的陈旧滞后,严重束缚了我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使我国文化产业在总体上呈现为徘徊不前的局面。

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巨大的机遇

当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历史性的机遇与挑战,机不可失,时不我待。

从世界来看,近年西方文化产业正酝酿着更大的发展,当代信息产业正在向创意产业(创造性产业)快速迈进,在美国,新经济中的文化要素构成了创造性经济的重要战略目标,欧洲、日本和韩国等国正在迅速崛起,文化产业的未来发展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商机。

从我国来看,经济全球化与加入 WTO,为我们参与世界文化产业竞争创造了条件,也逼迫我国文化产业不得不进入国际大循环。从现实条件来看,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迅速进入小康社会的现实态势对文化产业的发展提出了内在的需求;特别是高新技术如 IT 业的高速发展,奠定了中国文化产业发展的科学基础与技术保障。文化产业需要高新技术,高新技术也迫切需要文化产业(内容产业、创意产业)发展的支持。而文化创新则和技术创新一起,构成了我国未来社会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不竭动力。

同时,作为成长中的经济大国,中国面对未来世界,需要也必须规划和大力建设发展中的文化大国和文化产业大国,重建“中国形象”和中国产业形象。发展中的经济大国必须辅之以新的文化形象与文化策略。中国需要全面重建文化。而在文化建设中,首先推进国内文化经济与文化产业改革并准备外向的产业发展姿态。

那么，中国成长为未来世界文化产业大国是否具有可能呢？综观当代世界文化产业发展，在要素组合中目前中国处于相对有利的位置。这包括：（1）中国作为发展中经济大国的综合国力的提升，（2）中国作为文化资源大国具有巨大潜力，（3）中国在经济领域改革的成功范例和经验，（4）中国近年网络等高科技发展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基础，（5）中国文化产业具有巨大的待开发人力资源（包括创意者群体资源），（6）中国自身具有的巨大文化市场，等等。

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首先是观念上的挑战。我们必须转变文化无关于国计民生的“形象”，全面调整对文化在社会转型与总体结构中位置及意义的认识。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文化的创造性是人类进步的源泉。文化多样性是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对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此，“文化政策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未来世界的竞争，是文化和文化力的竞争。

其次，我们必须把文化作为生产力来重新认识，探索发展先进文化生产力的道路。文化生产力观念表明，今天的文化作为一种大规模的社会生产，它就天然地具有社会生产的基本特征，具有流通、交换、消费等基本环节，具有市场条件下经济运作的全部过程。而第三代生产力的重要特征便是“文化的经济化、科技化”和“经济、科技的文化化”，以及由之产生的当代文化经济科技的一体化趋势。我们必须重新认识文化的经济功能和经济、

科技的文化含量。同时，文化作为先进生产力，文化产业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当代世界兴起的先进生产力是以高科技为基础的文化生产力。先进的社会生产力总是在先进文化的开启和引导下向前发展的。当代经济、科技与文化的一体化包含的两大趋势——经济的产业下游化与公民需求上游化、高级化，就是以人的不断变化提升的需求为根本的。

但是目前，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仍面临着严峻的问题与困境。这主要表现为我国现有的文化产业基础十分薄弱，体制上延续计划经济的基本格局，仍然存在着四大壁垒——所有制壁垒、部门壁垒、行业壁垒、地域壁垒；市场化程度很低；并且，毋庸讳言，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中还存在着文化产业发展与主导意识形态的协调等众多问题。

运用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展文化体制创新

面对挑战和机遇，我们必须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全面贯彻党的十六大精神，落实十六大提出的文化体制改革和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决策。坚决冲破一切妨碍文化发展的思想观念，坚决改变一切束缚文化发展的做法与规定，坚决革除一切影响文化发展的体制弊端。运用经济改革的成功经验，开展文化体制创新。

制度决定长期。的社会经济绩效。目前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与文化体制改革出现不对称或不平衡，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文化体制改革滞后或严重滞后，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与文化产业之间不平衡，要求对文化产业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而文化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必然要求文化体制改革。

文化体制的首要问题是计划体制与市场方式的矛盾，文化的

市场改革将成为整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体制改革应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框架体系内思考和规划。稳步有序地向国内外各种所有制的经济实体放开文化市场准入限制；努力锻造在内外两个市场上具有强大核心竞争力的市场主体——文化企业。政企分开、管办分开、现代企业制度等在经济改革中行之有效的改革实践应在文化领域积极推行和实践，经济、管理领域各个环节的成功经验和大量人才应全方位进入文化创新领域。总之，应借鉴世界各国文化管理上的经验，逐步消除壁垒，在市场经济的主导框架内推动体制改革。

理论创新是我国文化产业发展的先导

在这样一个当代中国文化产业加速发展的新阶段，理论创新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理论创新既是观念的解放，知识的转型，新思路的开拓，又是国家文化政策制定的依据，是对未来文化产业发展方向的预测，是一种总体的文化战略的部署与策划。理论创新是体制创新、制度创新的先导，也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规划未来文化产业发展蓝图的必要准备。

当代文化产业的发展首先必须进行文化观念的变革与创新。对文化的认识将全面改变我们对待当代文化产业发展的态度。

从国际上看，20世纪80年代以来，文化与发展日益引起世界各国的普遍关注。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的发展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一部分，而脱离人或文化背景的发展是一种没有灵魂的发展。文化作为发展的手段尽管很重要，但它最终不能降到只作为经济发展的手段或促进者这样一个次要的地位。发展与经济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发展可以最终以文化概念来定义，文化的繁荣是发展的最高目标。而文化政策则是发展政策的基本组

成部分，未来世纪的文化政策必须面向和更加适应新的飞速发展的需要。

先进的文化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发展，说到底是以人为目的、服务于人、服务于最广大的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和根本需要的。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人们的社会需要也不断提高。在基本的物质层次满足的基础上，人们更多地关注文化上的、精神上的、心理上的需要，注重个体的全面发展和人的生存质量。即使物质层次的衣、食、住、行需要也大大的文化化了。随着生活的日益提高，人的更高级需求便会优先增长，精神文化附加值的经济含量和财富含量越来越高。而文化产品与文化消费则会优先增长。

总之，当小康时代的来临，人们的初级的、低层次的、偏于物质层次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之后，高级的、更高层次的、精神的、心理的需求就会凸现出来。人们要追求更高质量的生活，追求个体的全面发展和全面实现。实际上，今日的经济学已在大力关注知识、信息、文化乃至人的心理，因此，未来的经济是创意经济、体验经济、精神经济和注意力经济（眼球经济）。

东方风来满眼春。正是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转型时期，理论和实践的探索才如此重要。为此，我邀请了中国文化产业研究领域的同仁，一起来编写这套“当代文化产业论丛”。我的提议得到了朋友们的热烈响应，使我备受鼓舞。今天，当这套凝聚着大家智慧、意志、艰辛的丛书（第一辑）面世，我们终于等到了这墨香醉人的时刻，我衷心感谢所有为这套丛书付出心血的朋友们。

这里，只是开始，不论是书，是人，还是文化产业的伟大事业。

北京海淀三灯阁

2004年12月28日

主编金元浦先生简介

金元浦，浙江浦江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重点学科学术带头人。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常务副会长兼秘书长。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运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北京市科技美学学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文艺理论》卷主编。辑刊《文化研究》主编，文化研究网 www.culstudies.com 总编。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在《中国社会科学》、《求是》等国内外报刊发表《文艺学的问题意识与文化转向》、《文化生产力与文化产业》等论文 180 余篇。出版《跨越世纪的文化变革——中国当代文化发展研究》、《文学解释学》、《阐释中国的焦虑——转型时代的文化解读》等各类著作 30 余种，主持多项国家和省部级科研项目，获得多种学术奖励。

1 / 前言

8 / 第一章 全球化与国际文化权力角逐

8 / 一、全球化及其后果

34 / 二、文化何以成为一种权力

44 / 三、两大阵营的文化“热战”

74 / 四、WTO 对 UNESCO: “硬法律”对“软规则”

90 / 第二章 国家利益与文化安全

91 / 一、重新定义国家安全

98 / 二、美国政府政策中的文化安全意识

109 / 三、从国家利益出发制定文化政策, 保障文化安全

139 / 四、研究文化安全问题应该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143 / 第三章 美国的文化政策

144 / 一、美国文化政策的主体框架

147 / 二、美国文化政策的执行机构

155 / 三、美国文化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大脑”和“手足”

162 / 四、美国的“文化外交”政策

180 / 第四章 加拿大的文化政策

180 / 一、加拿大文化管理机构及产业概况

195 / 二、加拿大文化政策的发展历史

202 / 三、加拿大文化政策的制定与实施

223 / 四、出版政策的个案分析

258 / 五、加拿大文化政策的启示

267 / 第五章 WTO 与文化政策

267 / 一、“狼”来了

268 / 二、WTO 规则对文化政策的影响

275 / 三、我国加入 WTO 在文化领域承诺的基本
内容

278 / 四、从美国与加拿大期刊争端看新国际贸易
环境下文化政策的调整

286 / 参考书目

前 言

本书收集了有关文化政策方面的文章六篇，因而定名为《国家利益与文化政策》。这六篇文章写于2002年至2004年，这一段时间，也正是文化产业、文化政策研究在我国逐渐兴起的时期。六篇文章虽独立成篇，却是围绕一个共同的主题展开的：在当代，文化力量在国际国内事务中到底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思考这个问题是我近年来阅读和写作的核心。

总的说，本书有几个关键词：全球化、文化权力、文化政策和国家利益。全球化是“冷战”后最显著的时代特征。我们用“冷战”这个词概括了半个世纪的世界历史和国际秩序，现在，该轮到“全球化”做主了。处于当世而不理解全球化，就好像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失去就国际国内问题与别人进行交流对话的基础。另一方面，确实需要有人对全球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细致的梳理，不能人云亦云，满足于西方文本中的定义。可喜的是，这几年，全球化这个词已经由学术文本走进政府文件，特别是新闻媒体，标志着国人对于全球理解的深入。

相比之下，“文化权力”是一个新词。我用这一概念来描述文化力量在当今世界的凸现。过去我们说某个国家权力大，通常

指该国的国土面积大、人口众多、经济发达、资源丰富、军队强大等等。而在全球化时代，权力的结构已经逐渐发生变化，文化开始作为一个重要的权力来源产生作用。我们现在习惯用综合国力比较各国权力大小，而文化正是综合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文化权力并不是从一开始就很重要的，它的力量的显现只是在全球化时代才突然迸发出来，并且只有在全球化的土壤中才能够持续生长。打个比方，茹毛饮血的时代，比谁的牙齿锋利；“冷兵器”时代，比谁的军队强大；后来，经济因素、武器先进程度又加入了权力的行列，电视剧《雍正王朝》中康熙帝慨叹：打仗打的是银子；现在，经济、科技等等因素仍然会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起作用，但在权力的天平上，文化的砝码日益加重，换句话说，现在到了比谁的文化实力强大的时候了。

文化政策是另外一个关键点。某些物质因素是先天继承的，土地有沃瘠、人口有众寡、经济水平有强弱、科技发展有先进和落后，这些短时期内无法改变，但文化没有绝对意义上的高下优劣之分，没有说哪种文化注定强盛，哪种文化一定衰弱。这就给文化政策发挥作用留下了很大的空间。文化权力的增加，文化实力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有效的文化政策，并随时代变化不断加以调整。

本书讨论文化权力、文化政策和文化安全，不是从哪个阶层、团体或个人的利益出发，而是从国家利益出发来探讨问题，以服务最大多数人的公共政策为准绳。这就需要我们弄清楚两个基本问题：一是文化在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的位置是什么，二是国家文化利益本身包括哪些内容。概括地说，文化在国家整体利益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如果丧失了民族文化身份和执政党的主流价值观念基础，我们在维护谁的国家利益呢？这也正是亨廷顿一直告诫美国政府的话：在思考什么是我们的国家利益之前，先

要弄清楚“我们是谁”。国家文化利益包含哪些内容，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应当从民族文化身份、主流价值观念以及文化产业实力和文化创造力中去寻找。

本书第一章《全球化与国际文化权力角逐》是全书的核心。本章首先对全球化这一基本概念进行了综合分析，我无意在纷繁复杂的全球化论说中再添一笔，相反，在收集研究关于全球化的诸多概念基础上，梳理出关于全球化的“三个关键词”（过程、网络和相互依赖），“三个驱动力”（技术创新、自由贸易和制度安排），以及“四个主要后果”（距离的“死亡”或边界的“消失”，民族国家作用的削弱，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作用的增强以及文化冲突的加剧）。希望通过这种提纲挈领的做法，帮助读者形成关于全球化的总体印象。其中涉及的另外两个概念——“文化”和“权力”也是多年来学者们争论的焦点，本章通过对这两个概念的介绍引出“文化权力”的概念，重点说明文化何以能够成为一种权力。这也是本书的核心概念之一。笔者对“文化权力”概念的应用也作了说明，指出“文化权力”不是一个“空对空”的概念游戏，在当今国际权力角逐中，文化权力的争夺和分配发挥着重要作用，左右了很多国际事务的进程。我在这里提出当今国际文化权力的冲突在美国和法国—加拿大“两大阵营”间展开，是从文化产品贸易、文化与政治交互关系的宏观层面出发作出的判断。也许有人并不同意这种看法，但这毕竟为理解当今国际文化交往特别是文化产品贸易冲突提供了一个视角。在写作这一序言时，我刚好看到了西方当代两位具有代表性的思想家——美国哈佛大学教授、《文明的冲突》一书作者萨缪尔·亨廷顿和伦敦经济学院院长、第三条道路政策的设计师安东尼·吉登斯，发表在2004年2月29日德国《星期日世界报》上的一次对话。两人都同意传统意义上的“西方”已经分裂，不过吉登斯认

为“冷战”后西方作为地缘政治的组合陷入了危机，亨廷顿则认为西方之间分裂的根本原因在于文化因素。从另一个角度印证了所谓“两大文化阵营”的分析。

第二章《国家利益与文化安全》主要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只有从国家利益的角度出发，文化安全的提出才有意义。对文化安全的概念可能存在着两种误解：一种认为这是一个意识形态色彩浓重的保守提法，我反复引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美国国家利益》两份报告的内容以及约瑟夫·奈、萨缪尔·亨廷顿、弗朗西斯科·福山等人的观点来说明文化安全是世界大国（great powers）尤其是美国都重视的问题。另一种观点倾向于空喊文化安全的口号，没有提出文化安全在政策层面具有的实质性内容。本章力求从对策研究的层面提出相应的看法。

在第三章《美国的文化政策》和第四章《加拿大的文化政策》中，我想通过两大文化阵营中的两个典型国家的文化政策模式，说明文化政策是文化权力运用的核心，是维护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的关键。美国是世界大国中唯一未设文化部的国家，美国政府官员们在使用“文化”一词时总是显得小心翼翼、讳莫如深。也许有人会产生疑问：美国有文化政策吗？通过阅读本章内容，我相信读者会认同我的观点，即美国不仅有文化政策，而且有极强、极有效的文化政策，只是没有公开挑明罢了。或者说，美国的文化政策是以价值观的形式渗透在其各项政策特别是外交政策之中，它是一种灵魂性、主导性的东西。在我看来，加拿大政府的文化政策非常有特色，我把它称作“加拿大文化政策模式”，它把文化、意识形态、经济和政治因素糅合在一起。加拿大文化政策特别值得发展中国家借鉴，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花了大量篇幅讨论加拿大政府文化政策的框架设计和具体实施步骤，并以出版政策为例，对加拿大文化政策进行了个案分析。我

特别希望读者重视章后所附的关于加拿大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的四篇访谈，这是加拿大政府官员、学者和出版商从不同角度对本国文化政策的评述，也是我们理解加拿大文化政策特别是出版政策的第一手资料。

2004 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三周年。按照中国政府的承诺，加入 WTO 三年后，我们在诸多领域对外资的限制都要放开。在中国，文化政策所面临的挑战没有比 WTO 来得更直接、更猛烈了。第五章《WTO 与文化政策》，介绍了 WTO 规则与文化政策可能产生冲突的“战线”，同时，通过解剖 WTO 框架下唯一涉及文化产品的案例——美国与加拿大期刊争端案，来探讨如何通过有效的文化政策解决文化贸易争端，维护国家利益。

本书的写作风格介于理论著作和对策研究之间。在阅读相关文献的过程中，我发现国内讨论全球化与文化的文章论著不可谓不多，特别是 2003 年 8 月中央政治局专题讨论文化问题以后，关于“文化产业”、“文化政策”和“文化安全”的言论更成为一时热点。问题是，学院式的探讨虽然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但对于实际问题终究隔了一层。关于文化产业和文化政策的研究，实践的意义大于理论的意义。所以从事这方面研究最理想的状态，应该是研究者本人具有一定程度的学术文化背景，又接触过具体的政策制订和实施工作。我在文中也谈到，在美国，学术文化研究机构与政府机关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的人员流动模式。远一点的例子如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曾为哈佛大学教授，近一点的例子如哈佛大学校长萨莫斯曾任克林顿政府商务部长，肯尼迪行政学院院长约瑟夫·奈曾任国防部助理副部长，现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也曾是斯坦福大学苏联问题专家。政府官员下台后去做大学教授和大学教授“投笔从政”的例子比比皆